

胡乔木之女、红二代胡木英谈延安精神传承

我们开团拜会，只有一碗清茶

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
见习记者 张红光

谈反腐>>

腐败与我接受的教育
完全格格不入

齐鲁晚报:在2月份的延安儿女联谊会团拜会上,您提到拥护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反腐,呼吁红二代“不打横炮、不帮倒忙”。对这段话,社会上产生了很多版本的解读,有人说是上层授意,是不是?

胡木英(哈哈大笑):其实我了解国家动向的唯一途径就是《人民日报》。那次发言是我把大家平时的议论,和在会前征求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综合起来,然后由我起草而已。

齐鲁晚报:你们每年都搞团拜会?

胡木英:团拜会始于延安,是毛主席倡导的。毛主席为了杜绝下属向领导送礼拜年影响工作,就在年前把同志们召集在礼堂,人手一碗清茶,进行“团拜”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团拜会,是从1984年开始的,我们已经坚持了30年。每年农历的年初,我们延安儿女聚到一起,没有宴席,没有礼品,只有一碗清茶,不讲究排场,简单朴素。

当时那段话的讲话现场,有不少人鼓掌。后来很多家网站转载。网民也有大量评价,有赞扬的,也有不少反对的,甚至过度解读的。

我说“不打横炮、不帮倒忙”,确实是针对社会上和红二代个人的言行说的。现在有些人拿“文革”说事,这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倒忙。对此,我有一句话,叫认清形势。我们一定要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和决定,深刻理解好形势的内涵所在。

齐鲁晚报:您所说的“认清形势”是什么?

胡木英:就是现在的主要任务。现在的形势相当复杂,习近平总书记要在这种形势下,采取有效的办法,集中打老虎拍苍蝇,我们应该集合社会各种力量支持中央做这样的事情。

我们之所以支持习近平总书记的“新政”,就是因为社会上的贪腐现象,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治的地步。总是有人说,习近平总书记的主张,对公务员队伍太狠心了。我听到以后很生气,说这话的人怎么不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呢?这些贪官是30多年积累下来的,并非突然出现的。一开始只是偷偷摸摸跑官行贿,后来越来越公开了,不知不觉间走到现在这一步。

齐鲁晚报:您为何对腐败如此痛恨?

胡木英:腐败,与我原先接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,完全格格不入。这种风气持续蔓延,延安精神就会渐渐消亡,而党最核心、最得民心的东西,也会逐渐消失。

谈父亲>>

一封印象深刻的
家书

齐鲁晚报:您一直在说传承延安精神,您所认为的延安精神是什么?

胡木英: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。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第二,父辈与老百姓深厚的天然感情。他们从老百姓中走出



3月3日,北京,胡木英接受采访。 见习记者 张红光 摄

来,学了本事,长了知识,然后再走向老百姓,一切都在为人民服务,所做所为都离不开他们。

第三是实事求是,求真务实的作风。做事要规规矩矩,做人要诚诚实实,表达最真实的想法,不要遮遮掩掩。

齐鲁晚报:说到延安精神,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?

胡木英:我记得是在1964年,我在外交学院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。当时入党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为了积极入党,我在参加大学生挖运河锻炼时,因太过劳累,还患上了肾炎。为此,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亲笔信,告诉我这不代表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地方。如果你有一天终止奋斗,不求进步,你随时可以把自己降低为落后分子。

这是我们当时所受教育的一个缩影,父母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,就是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所以你要参加到这个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中去。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。

齐鲁晚报:您曾说传承延安精神,是延安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?

胡木英:作为“红二代”的我们,理应承担起传承的历史使命。我们很少像其他孩子那样享受到父爱和母爱,我们中一些人的父母都为革命流血牺牲了,这些人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见过。所以从懂事起,我们就受到革命的熏陶,吃了很多苦,遭了很多难,因此也更坚强。同时这种延安精神,我们也体会得最深刻,有义务、有责任,当然也有能力去传承。

齐鲁晚报:你们是如何传承延安精神的?

胡木英:延安儿女联谊会平时会组织很多活动,一个月有好几场。比如优秀共产党员的纪念活动、组织唱红歌、观看红色题材影片并座谈等。

最近正在拍一部关于延安儿女的文献纪录片——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,是由140多位延安儿女,讲述他们自己及父辈们经历的故事,反映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,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培养教育后代的。延安儿女联谊会组织人员成立了专门的公司,历经7年时间,拍了这部32集的文献纪录资料片。

这部片子已经通过国家相关部门审查,我们今年考虑通过

电视台或影院等不同方式向社会公开播放。

谈传承>>

为拍纪录片
得找企业“化缘”

齐鲁晚报:那这些年,宣传延安精神的效果如何?

胡木英:延安儿女联谊会通过组织活动,演出,讲话,报告讲座,报刊宣传、公开的影像资料等方式,弘扬延安精神,传播延安文化,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但是,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不少人曾对我说,你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?有谁听,何必呀?

齐鲁晚报:很多人不理解你们,是吗?

胡木英:有些年轻人是不太理解。在一次大会上,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写了一首政治言志诗《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》,结果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;2013年春节,一次团拜会上,张亚南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,被人形容为“神经病”。

齐鲁晚报:那您为何还要坚持去说?

胡木英:作为延安儿女,我们再说,那就真的没什么人说了。

齐鲁晚报:在你们宣传延安思想过程中,遇到过哪些困难?

胡木英:我们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支持,完全是延安儿女的自愿行为,一切活动都要自筹自支。资金、场地、人员联系、影像拍摄和制作,处处都很困难,还特别繁琐。我们不断找企业“化缘”,但前提是,我们不与任何商业利益粘连。所以,我们平时开销都很有计划,能节约就节约,能省则省。

不过,岁月不饶人,“红二代”们现在也正在慢慢老去,我们的腿脚也不太方便,办事情更不方便。我们没有公车,都是坐公交,乘地铁,有的人光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就得4个小时。

齐鲁晚报:这些困难都是如何克服的?

胡木英:就拿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这部文献纪录片来说吧,我们一遍遍地联系革命后代,有时甚至要打十多个电话给他们做思想工作。启动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的70万元资金,就是在银行系统的

“红二代”帮助下解决的。

谈身份>>

我退休时
只是个处长

齐鲁晚报:大家都说您曾经是

国家工商总局的大领导?

胡木英:我最后就是以一个个处长的身份从国家工商总局退休的。有不少人说我是局长,可能大家以为“红二代”肯定是高官,其实不然。

齐鲁晚报:在延安儿女联谊会中,大家的身份都是怎样的?

胡木英:延安儿女中,大多是普通公务员或者科技教育文化界业务人员等。虽然我们中间也有高官、富豪,但那是少数人。这样的人在联谊会也呆不长,他们有自己的利益。还有很多“红二代”是以普通工人的身份退休的。

齐鲁晚报:不可否认,在很多人眼中,“红二代”会有很多特殊待遇。

胡木英:这是想当然的认为,其实不是这样。我们延安儿女从小就被送到寄宿制学校,从来没有机关大车接送,回家都是坐学校的班车。从中学到大学,再到“文革”时下乡劳动,我都是跟同龄人一样。没有任何特殊待遇,我还记得刚到天津郊区劳动时,床上都是跳蚤,打都打不完。

社会上有些人说我们保卫延安精神、红色江山是为了继承父辈“江山”,继承特权,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,他们就太不懂我们了。只要看看我们的学习、工作,了解我们退休后的情况就明白了。

齐鲁晚报:这种“草根”身份,给你们带来了什么?

胡木英:我们对于形势政策的判断,也是看最广大老百姓是否得益。我记得父亲曾经带着我到湖南湘潭农村去调研,父亲和农民的感情特别深,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。他们与工农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纯粹,让我受益匪浅,这些正能量的东西是无可替代的。

深入,更见精彩

电话:96706056

洪波工作室

邮箱:hongbogongzuoshi@163.com

记者手记

“如果不站出来,
就没人说了”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
见习记者 张红光

“我出生一个多月就得了肺炎,当时,延安缺医少药,是警卫员举着中药,游过延河,送到延安中央医院后,我的病才得以治好。可以说是延安的叔叔、伯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”

一张简易的木质办公桌,一把有些落漆的椅子,一块已经破旧不堪的窗帘,搭成了他们梦想已久的“摄影棚”。在“摄影棚”里,一位七旬老人端坐其中,讲述着他们在延安的童年。

这是纪录片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中的一个影像。而制作这些光盘的发起人,就是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,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、胡乔木的女儿——胡木英。

3月1日,北京,初见胡木英,她把这几张光盘送给我们。

“延安精神需要不断传承下去。”胡木英说话干脆而有力,这是她给本报记者正式说的第一句话,也是重复最多的一句。

走在大街上,看不出胡木英跟其他退休老太太有什么区别。然而,频频的公开讲话,与她低调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曾经做过胡木英专访的口述历史专栏作家周海滨说,胡木英组织活动,是一定要上台讲话的,每年的团拜会、相关纪念活动,都少不了胡木英的身影,内容不外乎针砭当今社会的种种乱象,最终落脚肯定是发扬延安精神。

和胡木英谈不了腐败,只要一提腐败现象,胡木英就愤慨不已。在与记者的交谈中,她下意识皱起眉头,用手指使劲地敲着桌角,提高嗓门,引来周围人的注目,不知道这个老太太为什么说起话来咬牙切齿。“现在有些官员,除了忙着怎么升官,怎么跑官,就是忙着怎么捞钱。为什么不替这么多老百姓担心啊?”

然而,尴尬的是,频繁的公开呐喊与坚定的表态,并没有让胡木英的声音成为主流。胡木英担任会长的延安儿女联谊会,有人也因各种原因退出。

周海滨说,胡木英作为“红二代”的“精神领袖”,其表达欲望是非常强烈的。这和她的成长经历、价值观念以及教育影响密不可分。现实社会上的贪腐、浪费以及奢靡、享乐、吃喝之风的盛行,与他们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,甚至水火不相容。

“但是这种观念现在并非主流,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同,再加上没有绝对的话语权,如今,其实并没有太大影响力。”周海滨说。

然而对于胡木英来说,她并不接受这样的现实,只要有宣传纪念活动,她就尽可能联系人员参加。《中共中央第一支笔》的作者丁晓平说,每年的团拜会胡木英都会打电话邀请他参加,《延安的精神》光盘放映活动,胡木英多次打电话给他,直到他来观看为止。

胡木英说:“如果不站出来,那就没人说了。”